

导 言

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的国度。与西方相比，我们的先哲对事实之真的追求相对薄弱，而对伦理之善、善之境界的追求尤为发达。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①

中国古代先哲们以独特的方式把握世界，初步形成了以天人关系为出发点，以传统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人生价值理论，基本确立了人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找到了人之为人的“最高支撑点”。梁启超、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生哲学，人生哲学的主旨在于追问人生的意义、寻求理想的生活。人生的意义是对自己“性命”的终极关注，人生的理想既是人人“应当”的生活方式，也是人人“可能”的生活方式。^②

中国现代人生价值论的建构，是在对传统人生哲学扬弃的

^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②梁启超：《儒家哲学是什么》，载《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冯友兰：《儒家哲学之精神》，载《三松堂学术文集》，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基础上，经过一番重新阐释和创造性转换，紧密结合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紧迫的人生问题来进行的。实际上，人生哲学的内容和体系一直存在争论。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将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四个部分；当代学者葛荣晋认为，中国人生哲学的内容应包括八个部分：人在宇宙间的地位，人的本质即人性论，理想人格与道德境界，人伦道德原则，道德修养和教育，道德实践问题，人生成功之路，生命观、祸福观等人生问题。

我国学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价值论思想资源，建构当代人生价值观应当而且必须积极从中汲取营养。问题在于从何处入手，着重点在哪里，应怎样做。我认为应从源头入手，首先把着眼点放在文化典籍的挖掘上，进行认真分析，最终做出选择与创新，构造新体系。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争议最多的著作，大概要算《周易》。《周易》堪称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代表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人生哲学的主流。它包含着许多珍贵的人生智慧，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几千年来，这些精神资源和人生智慧培养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中国当代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的建构，应当从《周易》人生价值论的研究入手，着眼于《周易》和其他文化典籍的分析与挖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蒙培元先生为前几年出版的本人拙作《周易与人生之道》作序说：“《周易》哲学的特点，正是将

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将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并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的智慧之窗。这样一种独特的哲学，既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也不是毫无超越意义的经验知识，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论、哲学与价值意味很浓的生命哲学。这样的智慧正是需要我们当代人不断反思、不断开掘的。’^①

作为中国哲学和文化久负盛名的典籍，《周易》不仅充分阐扬了传统伦理道德，包含着大量的伦理资源，而且作者对人生价值予以特别地关注，着力阐发形而上的价值本体论。其思维方法是以人道观天道，以天道证人道。基本思路就是肯定天与人的统一性，视天道为人道所本，人道为天道的归宿，以阴阳变易展现人生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关照人善恶吉凶的性命之情理，最终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理论。《周易》人生价值论的主旨，在于以刚健有为的价值取向和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生信念，挺立了人之为人的独立人格与力量。

天人问题是《周易》人生价值论的出发点。在天人关系理解上，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但具体理路并不相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把人与道、天、地并列，提出“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们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也就是在“天人合一”模式下将德性的人化为自然的人，实现天与人在自然性上的统一。这种“自然”拒绝一切人为的东西，包括儒家“强加”于人的仁义道德、纲常伦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天人合一”模式中赋予“天”以最完美的德性，他们主张“中庸”“人和”，遵

^① 刘玉平：《周易与人生之道》序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循“尽心知性知天”的向度，把道德价值的源泉从天那里转移到人自身，倾向于将自然人化。孔子、孟子、荀子在辨析天人关系时表现出相近的趋向，他们在肯定天人统一的同时，又通过天人之分以突出人文的价值。孔子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可以“相与”的只能是文化化了的人（斯人之徒），这里内在地隐含着超越自然（天）的要求；孟子一直强调人之为人而有不同于禽兽的本质特点，荀子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他们都把人的文化创造理解为对自然（天）的超越，即着重以人文对自然的超越来展示自我的人化（孔孟）和对象的人化（荀）之意义。而化自在的对象为人化的存在，总是意味着天与人之间的某种间断（不是隔绝）。

与此不同，《周易》在天人关系理解上有其鲜明特色，对天人关系的解读着眼于历史延续性。《易传》中的《序卦传》总纲式推论从天地自然推衍出人类社会、礼义人文，表征了天与人的关系既有间断性，又有着内在的连续性。《系辞传》则指出，古包牺氏之王天下，仰观天而俯察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彖传》阐发贲卦卦义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把人类文明起源及文化创造与自然万物联系起来，着眼于天人之间的相通、相融，从更深层次上肯定了天与人的内在连续性。正如学者杨国荣先生所言：“相形之下，《易传》的视域则开始由人对天的超越，转向了文化创造的自然前提，而天与人的关系，则相应地由历史的间断呈现为历史的连续。”^①正是在天人关系

^①杨国荣：《善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6 页。

的历史延续性中，《周易》以天和天道论证人和人道，建构起不同于儒、道二家的人生价值论。

《周易》本身是一部集合了不同层次，从具体经验到一般概念又到哲学思想的混合之作。这是一种奇妙的混合，表面相互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包含着深层的考虑。本身的复杂性加上历代解《易》者众说纷纭的解释和发挥，其神秘的光环和疑难之迷足以令人眩晕。越是神秘而疑难，人们越是要去探索，它的吸引力就越大。

《周易》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最深刻的吸引力来自于它的思维方式。从孔子到朱熹，历代易学研究气象斐然，蔚为大观。不论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其研《易》成果都可以看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易学思维的魅力，可以看作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丰富多彩的人生智慧。本书不是一般易学史的描述，而是通过自汉至宋代的主要研究成果，发掘其中独特的易学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人生价值论。

上篇

第一章《周易》概述

历代易学家治《易》，都无法完全回避一些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见解，制约和影响他们的易学观和易学思维。因此在本书开篇中，将简要概述一下《周易》的名称由来、基本结构、经传作者、成书过程、帛书研究、思维逻辑起点等方面问题，以期给读者一个大概印象。

一、命名之义与基本结构

在现存古籍中，《周易》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左传·昭公七年》）。

关于“周易”的含义，历史上有不同看法。“周”字大体有两说：一指周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说：“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美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

礼》，题‘周’以别余代。”^①。二取周普之义。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孔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释“三易”之义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孔疏结合先人看法，兼顾了上述两说，其观点具有代表性。自此以后，注《易》家多以“周”为代名，今当从之。

“易”之含义，历来识见不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易，蜥易，蝺，守宫也。象形。”蜥蜴即长有四足的蛇一类爬行小动物，特点是善变，故被古人视为测知阴阳消长、刚柔屈伸的神物。《说文》又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古人认为，“易”字从日下月，取日月更迭、交相变易之义。有说“易”的甲骨文形状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中，以示变换、交易。当然，在“易”的解说中最著名的是“三义”说，《周易正义》引《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并作了详细解释：“‘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赞同“三义”说，只是将其一义“易”明确为“易简”。清代毛奇龄撰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该书皆为此版。遵先例，有时简称孔疏。

《仲氏易》，略综前人之见，提出“五义”说，谓“易”兼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其中“移易”即荀爽的“升降”，“反易”、“对易”即虞翻的“反对”与“旁通”。尽管上述见解不同，但异中之同是变易之义，可以说其旨不离变易，甚至说举变易而它义可赅。古代典籍多将《周易》简称为《易》，即抓住其所贯通的变易之旨。

《周易》作为“六经”之一，始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早在西汉初，它就被列为学官的“经”书之一，因《易传》合入“经”内并行，学者遂尊称为《易经》，这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易经”概念。

《周易》流传下来最早的版本为魏晋时期王弼、韩康伯注本，唐代孔颖达为之作疏。南宋朱熹曾依程颐之见，对《系辞》的个别内容作了调整。通行本将《彖》、《象》、《文言》附于相应卦之经文后，其余各篇附于全部经文之后。今通行本基本结构由经（古经）、传（《易传》）两部分组成。

古经包括符号与经文两部分：六十四卦之卦、爻符号，经文即全部六十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辞。

《易传》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解释《周易》古经的文献，亦即古经的第一个解释系统，由《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组成，故又称为“十翼”。在先秦，人们已将这种解释、发挥《周易》卦爻之辞的文字，称作《易传》。“十翼”之名，最早见于《易纬·乾坤凿度》：“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其后，用“十翼”作为《易传》的别称，逐步为历代易学家所接受。

二、经传作者与创作过程

《周易》的作者、创作时代和过程，是古往今来众说纷纭的问题，因其关系到学派属性和思想内容等方面，故又是易学史上诸多问题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周易》创作，班固和司马迁的观点久负盛名。《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易经》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伏羲“始作八卦”卦象；周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在每卦与爻后分别系上卦、爻辞；孔子作《易传》“十篇”，以传解经。《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东汉的经师和南宋朱熹在“三圣”基础上又加一圣，把爻辞的创作权从文王那里划归于周公。“三圣”或“四圣”说，自汉至唐之治《易》者，皆深信不疑，具有传统的权威性，显然属于崇古拔高式的神圣化。

这种情形至宋代始有改变，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此产生疑问。欧阳氏考辨了《易传》七种，指出《文言》、《系辞》、《说卦》之间存在相互抵牾之处，《系辞》前后文亦有自相矛盾之处，《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非出自一人之手，不可视为孔子所作。自斯之后，疑古学风渐启。尤其近现代以降，“三圣”与“三古”说陆续被否定，一些新观点问世。如顾颉刚认为《易经》是周初作品，非伏羲、文王所为；李镜池指出古经编定于西周晚期；郭沫若认为《易经》当在春秋以后，孔子再传弟子鬲臂子弘所作。关于《易传》，说者多循欧阳修看法，如郭沫若进一步推测《易传》大

部分是始皇三十四年后荀子门徒所著；钱玄同认为《说卦》、《序卦》、《杂卦》三篇，是西汉中期以后加入的汉人的伪作；李镜池对《易传》诸篇具体推测，指出《彖》、《象》作于秦汉间，《系辞》、《文言》作于汉昭、宣年间，其它则于其后而出现；高亨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是多人长期的创作，其对古经的解说犹如以卜筮之“旧瓶”装入哲学思想之“新酒”，研究《周易》应当以经观经，以传观传。这些见解均包含诸多合理性，疑古精神可嘉，但似存在疑古过勇的倾向。

细读古经和大传原著，参考历代易学家研究成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周易》的创作经历了远古时代至春秋战国之间漫长过程。套用班固《汉书》的语言格式，可以说它确是“人更多手，时历多世”，由集体参与创作而成的作品。

概而言之，西周以前的漫长时期，古人在生活中就进行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观物取象、拟诸形容，开始运用八卦并进而逐步重为六十四卦符号进行占筮活动，甚或还附有简单的筮辞，表明人们已从形象思维向初步的抽象思维过渡；殷末周初，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丰富，促进了人们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当时的学者或者“掌三易之法”的史官们，在原有筮例素材积累的基础上，开始自觉地汇总、加工、整理，逐步使卦形符号规范化，充实和改编卦爻辞文句，确定六十四卦卦序，基本形成《易经》体系。在历代不断的释经、传经、阐经的过程中，人们的抽象思维水平得到飞速发展。随着学《易》与治《易》者的大量增加，特别是较高水平学者的不懈研究，出现从不同角度阐释易理的作品，这就是汉儒称为“十翼”的《易传》陆续问世。应当说，今本《易传》除贯穿儒家思想倾向

外，因受时代思潮影响，还吸收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思想。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易传》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可能出于战国至汉代孔门后学。

刘大钧先生据《左传》、《国语》所载筮例考证认为：“孔子在前人说《易》的基础上，曾经对《周易》作过一些口头解释，他的弟子及后人把这些阐释记录下来，并加工补充，到战国初期至中期，形成了《彖》、《象》、《文言》、《系辞》的主要篇章。这些篇章反映了孔子思想，是后学托孔子之名而作。”^①此说甚是。近年来，特别是帛书《易传》的出土及研究，进一步表明孔子的确对《周易》作过许多解说。^②

三、帛书《周易》研究成果览要

马王堆帛书《周易》，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第三号汉墓中，其后经过专家整理，陆续在《文物》等国内相关专业刊物上发表。近年来，随着帛书《六十四卦》经文的刊行和帛书《易传》的面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出现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帛书《周易》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其研究，大致可分为文献特征、经文研究和传文研究等几个方面。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尤其在训诂校勘方面成果颇丰，如李学勤、于豪亮、张政烺、严灵峰、黄沛荣、张立文等先生的论文，影响较

①刘大钧、林忠军：《周易传文白话解》，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2页。

②刘大钧：《今本、帛本、汉唐诸本〈系辞〉异同考》，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

大。许多学者认为，马王堆帛书《周易》应该是与今本《周易》经传内容非常接近的一个传本，此本在当时可能与今本并传；它是一部地方易学教科书，三号汉墓墓主（可能是西汉初长沙国丞相轅侯利苍的儿子）拥有此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收藏。^①李学勤先生详细分析了帛书的拼接缀合，结合有关内容的文献特征，指出帛书《周易》共包括两件帛书，可以称作上下两卷，即上卷《经》文，《二三子问》上下篇，下卷：《系辞》，《易之义》，《要》，《繆和》，《昭力》。^②张立文先生认为，参考古书定名通例，《二三子问》改定名为《二三子》更妥当。^③邢文博博士经研究认为，帛书《易之义》应当名作《易赞》（邢著，第45页）。

经文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帛书《周易》的卦序问题上。卦序是经文极为重要的部分，经文的卦序特征可以为《说卦》三章问题的探讨提供新的思路。帛书《六十四卦》除卦名多见通假字外，卦序排列与今本明显不同，有学者已进行列表对比（见邢著第34至37页）。帛书卦序的构成基于《说卦》的思想，帛书《系辞》曰：“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搏（薄）。”这与今本《说卦》中的表述不同，张政烺先生指出了两个优点：一是今本言“火水不相射”，不相射则不接触，构不成矛盾。帛本无“不”字，水火矛盾，故言相射；二是水火在山泽之后，雷

①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第225页。以下简称邢著。

② 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意见》，《文物》1994年第1期。

③ 张立文：《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国际易学研究》第1集，第71页。

风之前，与八卦方位图相合。^① 目前虽然在帛本与今本谁先谁后及卦序问题上尚无统一认识，但大家普遍认识到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有卦位上的依据，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表现出与今本“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相异的编排法则。

传文研究首先围绕帛书《系辞》的字数、学派归属、与今本《系辞》比较等问题展开，特别是学派归属问题。《系辞传》向来被多数学者视为儒家的作品，但马王堆帛书问世后传统观点受到质疑和挑战。以陈鼓应和王葆玟为代表，提出帛书《系辞》的道家思想更强烈、更具体系统，它与黄、老都有相同之处，但更接近老子，可以看作战国晚期老子学派的传本，为此作出了历史观的证明、哲学范畴的证明以及帛书出土地域和墓主身份的证明。以廖名春和吕绍刚为代表则坚持儒家说，认为道家说夸大了帛本与今本的差异，颠倒了两者的关系。

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20世纪以来争论较大。帛书《易传》特别是《要》篇中记载了孔子晚年研读《周易》的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有关孔子和《周易》关系的极重要的材料”，是孔子讲《周易》的“一个旁证”。吕绍刚先生在《〈系辞传〉属儒不属道论》一文中指出：“帛书《易传》充分证明《系辞传》是孔子作。”

易学在先秦至汉的传承，《史记》和《汉书》中有所记载。从《易传》到汉易孟京象数学派的兴起，期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解《易》著作均已失传。帛书《周易》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空白，为研究秦末汉初的易学真相提供了新的史料。与此相关，帛书《易传》中的象数学说对

^①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第14页。

弄清易学史上的某些环节，如卦气说、之卦说、卦位说等，都有一定帮助。

卦气说是《周易》象数学中的重要学说，一般认为始于西汉孟喜。刘大钧先生曾专就帛书《易传》中的象数说作了分析说明（见《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帛书《易传》所见卦气说，改变了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认识：至少在西汉初就流行的帛书《周易》中，已经可见四象卦气与八卦卦气说，表明卦气说并非源于孟喜、京房，而是更早的时期。廖名春先生考证后指出：“若溯其源，当上推至先秦。”^①

刘大钧先生认为汉易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其源出于先儒古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均有‘卦气’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之名，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析’‘因’‘夷’‘隩’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由此可见，‘卦气’说渊源久远”。^②近年来，刘先生围绕《周易》古义、今本与帛本《系辞》异同、今本与帛本《周易》疑难卦爻辞等，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辨析工作，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孔子研究》及《周易研究》等专业期刊，发同行之新见，不断将易学研究引向深入，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誉。

也有学者经研究发现，帛书《易传》卦气说还表明，卦气说的核心在于“时”的观念，卦气的本质在于卦与时的配合。

^①廖名春：《帛书〈易传〉象数学说考释》，《象数易学研究》第1集，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②刘大钧：《“卦气”溯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认识象的意义，可从卦与象、象与变以及象与时三个层次的考察入手，进而把握由卦而象、由象而变、由变而时的线索，探究象与时的内在关系及帛书《周易》传文所见的意义，重新认识卦气说（邢著第154页）。损、益二卦卦象特征的发现，意义不仅在于汉易象数学本身，而更在于其中的天时之义。‘卦气说对于时的强调、卦的神性特征，与帛书《周易》的卦序思想、游宫思想及帛书《周易》的火水之说等，共同构成了认识帛书《周易》天、地、民、神、时‘五行’说的思想基础。’（邢著226页）

四、易学思维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作为一部古老的典籍，《周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受到人们的推崇，汉代被尊为五经之首，在其后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之重要，它对传统文化影响之广且深，是人们普遍承认而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数千年来，对《周易》典籍的流传与演变的研究，包括辨伪与考证、解释与阐发等，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专门之学，这就是易学和易学史。易学有其特殊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形式；易学史则是对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易学思维和思想的历史展现。《周易》最深刻的吸引力来自于它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学来说，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在接受、反映、加工外界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就是所谓思维方式。它在民族的文化行为中普遍地、长久地起作用，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因而是人类文化现

象的深层本质。思维方式的不同，制约着民族思维类型的形成，决定着民族文化传统的走向，造成了民族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差异。易学思维发端于春秋时期，通过对《周易》的理解和解释而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是中华民族观察、体悟、反思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视角。几千年来，易学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倾向，塑造了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等）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特质。

《周易》成书的过程十分复杂，但透过历史现象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猜测和揣摩出其中的些许奥妙，可以归纳出较为清晰简明的思维轨迹：《易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远古时代人们思维从符号体系到文字表意的推进。“符号体系”，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卜筮系统。朱伯崑先生比较了殷代的龟卜和周代的占筮两种形式，认为占筮根据蓍草排列所显示的变化，由此进行的卦象分析包含逻辑的推演，有较多的灵活性和思想性，“意味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卜问吉凶的人为的因素增加了”^①。符号体系反映了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巫术文化的特色，如果说其中蕴含着某种智慧，至多只能说是一种神人交感的观念，透露出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

“文字表意”，就是《易经》在并无高深意义的卦爻符号体系外，新增加的一套由卦名、卦辞和爻辞所组成的文字表意系统。虽然这套文字表意系统的素材来源于原始占筮，即占筮活动的记录，但毕竟是人（史官）自觉性的创造，并经过了一定

^①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的加工和整理功夫，即“人文化成”，而后系于卦爻符号下。这就可以借助文字的提示作用（中国象形文字具有鲜明的特点），赋予符号体系以某种意义，充分发挥占筮潜在的优越性，由此引发出更高水平的象数思维模式，从而扬弃了原始占筮单纯依据蓍草排列窥探神意的低级思维。通读卦爻辞，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文句用自然事物变化比拟人事变化，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大量的卦爻辞通过对立事物的矛盾喻示人生际遇转化；有些明确讲人事的吉凶给人以劝诫与警示；另有卦爻辞反映了当时宗教的变革和以德配天的观念；还有些卦爻辞则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政治、科学、哲学等方面知识等等。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和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于天人之道的思考，对以后易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今本《易传》，至迟在汉朝就已被人们尊为《易》，取得了“经”的地位。《周易》的外延与内涵主要是通过《易传》而后确定的。在从《易经》到《易传》的长达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一次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的重大转折。就《易传》的性质而言，我们应当说作为第一部系统解释和阐发《周易》经文的论文集，《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它是综合而复杂的：一方面继承了先民占筮的观念，对古经的占筮作了理论化的解说；另一方面又把《易经》所蕴含的义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融入了作者丰富而深刻的新思想。因此，《易传》实际上是一种哲学与卜筮巫术的奇妙结合，虽有时分开谈，但多处合而论，哲理中含占筮，占筮中蕴哲理。

就思维模式而言，《易传》贯通一种天人整体思维。这种